

湖南省博物馆主编

湖南省博物馆

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文选珍题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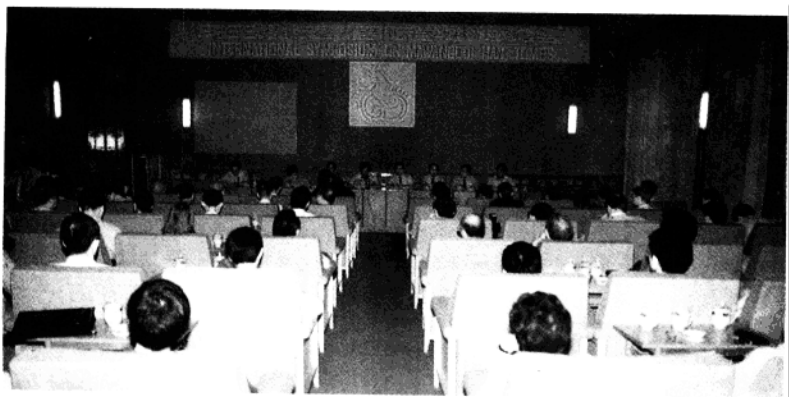


199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馆视察



199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尉建行来馆视察

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





商代虎纹铜饅



商代兽面纹铜饅



商代蛙纹铜饅



商代象纹铜饅



四虎铜饅内腔伏虎



象纹铜饅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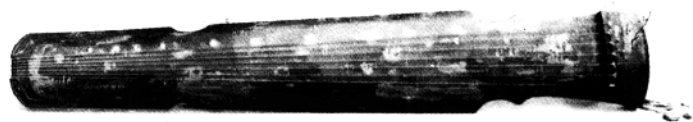
商代四虎铜饅



商代象纹大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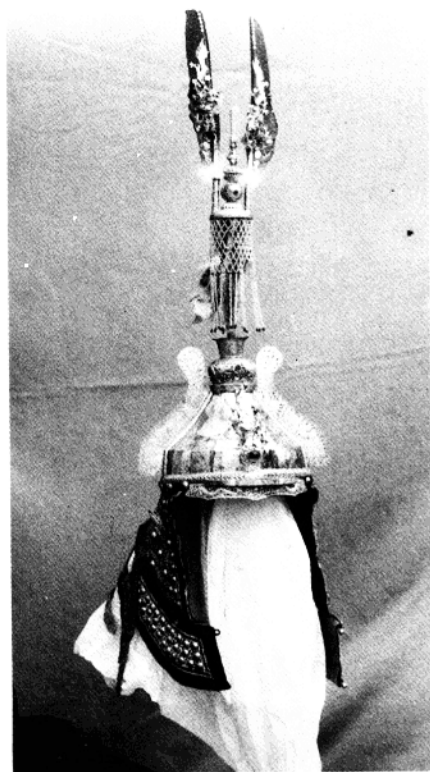
辽·鎏金观音铜像



唐·“独幽”七弦琴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清·双管雕翎头盔



文征明《江乡深翠图》

南渡至道州為
東門何氏十三
世泰來明萬厯

公諱凌漢字雲
門亦字仙槎先
世青州益都宋

何绍基楷书其父神道碑

繫務器用觀禮斯
會布筵依位仁廩
伊秩呂豐其儀呂
壯其室

華陽王元亨何紹基

兄者畫皆觀歌往時李伯時為余
作李廣奪胡兒馬拱見南馳取胡
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解解所
直落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頃日使
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
深學畫格今文章向一閱經但難
得入神會耳

子世世為環肥何紹基

何绍基草书中堂

何绍基隶书轴

献 辞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 刘健民

在1996年10月的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湖南省博物馆建馆开放四十周年，心情激动，感慨万分。在此，我代表省文化厅向省博物馆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该馆事业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向支持、关心该馆事业发展的有关单位和国内外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湖南省博物馆从1956年正式建馆到现在已走过了四十个年头，步入了不惑之年。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道路曲折艰难，但它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下，在博物馆几代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博物馆无论在陈列展览、文物保护与征集、科学研究、对外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已成为我省对外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我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也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我们为它的茁壮成长而自豪。

1986年庆祝该馆建馆三十年来，在这十年中，省博物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广大职工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三大职能，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综合利用馆藏品和办出更好的优秀展览等方面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在以陈列展览来鼓舞人、教育人，发挥了它独特的功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文化，使广大人民从陈列中激发爱国热情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在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发挥馆藏品的作用等方面，摸索出了新的思路。特别是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该馆努力扩大对外交流，馆藏品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新加坡、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展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它不仅仅扩大了该馆的知名度，同时也扩大了湖南的影响，架起了湖南与外界的友谊桥梁，为湖南的改革开放，湖南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回首昨天，成绩固然可喜，然毕竟已成为过去；展望明天，前途光明而坎坷。在前进的旅途中总是困难与光明共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四十年的艰苦经营，湖南省博物馆虽已初具规模，但处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省博物馆要继续往前发展，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人才的培养，陈列展览的更新和设备老化，展厅面积的狭小，条件的简陋等。特别是我国正在加大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给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带来很大压力和生存危机，同时伴随不少机遇。进入不惑之年的省博物馆已积累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一支力量较强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队伍，希望博物馆在新的形势面前，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楚人精神，捕捉各种信息和机遇，找准支撑点，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优势，开创博物馆新的局面，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我们坚信，湖南省博物馆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再创辉煌。

FH17/21

序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 熊传薪

今年是湖南省博物馆馆庆四十周年，在馆庆之际，承蒙各方面和同仁们的支持，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以示庆贺和纪念。

从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现在已整整四十年了，按俗话是步入了“不惑之年”。回顾我馆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显得艰难而曲折，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博物馆几代职工的努力下，我馆已发展成为一座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我们欣喜，我们自慰。

记得在1986年曾举办过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周年馆庆。自三十而立之后，在这新的十年，我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跃上了新的台阶，无论是在馆舍规模的建设、人才的培养，或是藏品的充实、陈列展览的更新、科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开展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加强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我馆的事业在兴旺、在发达。

举办陈列展览是我馆工作的中心环节。十年来，我馆紧紧抓住陈列展览这个主旋律，多次对主体陈列——《马王堆汉墓陈列》从展览内容、形式设计、展出文物进行了修改、补充，同时进一步改善了参观条件，该展览跻身入一流陈列之列，观众长年不减。同时我馆还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发挥人才与文物优势，举力了五十多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临时展览，如《红军长征在湖南》、《潘玉良画展》、《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曹瑛同志捐赠珍贵文物展》、《大型恐龙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近百年历史回顾展》、《湖南地方民俗展》、《古代服饰国宝展》、《东方巨人毛泽东》、《禁毒大风暴》、《日本侵华暴行展》、《惩治贪污贿赂成果展》等，深受观众的欢迎。同时，我馆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赢得更多的观众，扩大我馆的知名度，把陈列展览推向了馆外。我馆筹办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宇宙·飞碟·太空探索展》及《东方巨人毛泽东》等，先后在黑、吉、辽、鲁、苏、浙、皖、贵等省和本省各地巡回展出，观众达数百万人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我馆在改革的浪潮中，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向兄弟博物馆提供了完整的陈列方案和资料，如《东方巨人毛泽东》、《总设计师邓小平》、《勿忘历史 振兴中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这不仅拓宽了搞好搞活博物馆的思路，也加强了博物馆之间的横向联系。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博物馆的联系，促进我馆进一步开放，是我馆十年丰硕成果的又一特色。十年来，我馆有数十人出国、出境进行学术交流或考察，扩大了职工的视野。在美国丹佛、伯明翰、辛辛那提、波特兰举办了《BC12至BC2中国湖南文物展》，在法国菲尼斯特省达乌拉斯举办《BC13至AD2中国湖南文物展》、《湖南民族民俗风情展》，在日本大阪举办了《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滋贺举办了《湖南省古代文物精品展》、彦根举办了《中国湖南出土文物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了《湖南古代文物珍品展》，参加了在韩国的‘95中韩古今刺绣交流展》、新加坡举办

的《荆楚雄凤展》、中国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齐白石画展》以及在法国、瑞士、英国等地举办的《人与神展》。这些海外文物展览，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桥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1993年我馆成功地举办了《法国西部风情展》，并与法国达乌达斯文化中心建立友好博物馆，这是我馆有史以来第一次引进国外展览及与国外博物馆正式建立友好关系。纵观十年来我馆的陈列展览，丰富多彩，可喜可庆。

十年来，我馆在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才辈出，硕果累累。1992年8月成功地举办了来自美、日、法、加、英、意、泰、瑞（典）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和大陆学者参加的《马王堆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力地促进了马王堆汉墓研究的广泛深入，加强了我馆专业人员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和联系。专业人员奋发努力，写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如《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论东周青铜缶》、《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商周青铜器动物造型和纹样与古代图腾崇拜》、《论汉代民货的登记及有关问题》、《帛书〈系辞〉初探》、《帛书〈刑德〉略说》、《马王堆汉墓两幅T形帛画之比较研究》、《关于马王堆古地图及相关的几个问题》、《马王堆汉墓漆器与汉初长沙地区风俗习惯》、《马王堆一、三号汉墓服饰述论》、《从马王堆汉墓出土动植物看汉初湖南气候》、《马王堆医书与饮食疗法》、《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巫术意义》、《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壁画、用壁方式及壁画制》、《从马王堆汉墓文物看汉代的饮食文化》、《马王堆汉墓葬俗研究》、《长沙窑瓷枕初探》、《湖南省博物馆藏铜鼓》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馆藏文物进行了研究，促进了我馆学术研究的深入。同时，专业人员编写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楚系青铜器研究》、《玺印鉴赏》、《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文物艺术品交易与收藏》、《湖南党史大事年表》、《三湘人杰》等专著，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华文物鉴赏》、《中国考古文物之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湖南省志·文化志》、《湖南省志·文物志》、《湖南大辞典》、《湖南人民革命史》、《西南军阀》、《湖南抗战画史》、《周恩来谋略》、《中国文物精萃大全——青铜器卷》、《叱咤风云——三十三位红色军事家》、《湖南青运史》等专著。对文物保管、保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1992年7月，我馆研究人员从事的《饱水漆木器PEG4000填充脱水定型研究》课题，通过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鉴定，为漆木器脱水摸索出了新的思路。总之，我馆专业人员在事业上的辛勤耕耘和努力，结出了科研的硕果，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向前发展。

从三十而立到不惑之年的十年，在湖南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上是短暂的，但由于我馆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和拼搏，留下了可记录的一页，值得永远怀念。任重而道远，我相信，在湖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只要大家充满信心，迈出改革开放的大步伐，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物馆为思路，湖南省博物馆一定会有希望，一定会发展，也一定会在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旧作新刊

-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 高至喜 (1)
- 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 熊传薪 (12)
-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 傅举有 (17)

殷商文化研究

- 论传长沙出土立鸟器盖 李学勤 (44)
- 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 何介钧 (47)
- 宁乡出土的商代大铜铙及有关问题 黄纲正 (69)
- 商代铜斧的功能 傅聚良 (74)

马王堆简帛研究

- 图诗与辞赋——马王堆新出“大一出行图”私见 饶宗颐 (79)
- 帛书《刑德》乙本释文校读 陈松长 (83)
- 马王堆汉墓帛书释读札记 刘信芳 (88)
-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补正 张显成 (92)
- 马王堆医书祝由术研究四则 喻燕姣 (103)
-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中的丧葬用车 郑曙斌 (108)
- 马王堆一号墓 T 形帛画与金雀山帛画之异同浅析 游振群 杨玲 (113)

楚汉文明探索

- 楚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与研究 刘彬徽 (119)
- 湘江下游楚文化早期遗存探索 郭胜斌 (126)
- 湘江流域青铜器上蛙蛇纹初探 熊建华 (133)
- 湖南永州鹧子岭一号汉墓的墓主及相关问题 贺 刚 (143)
- 长汉西汉“渔阳”王后墓“偶人”及相关问题 邱东联 (152)
- 楚汉墓葬出土屏风略论 聂 菲 (156)
- 汉代漆器文字综述 符 钰 (167)
- 湖南瓷器起源探讨——兼及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多元性
..... 李建毛 (174)

馆藏文物选介与研究

湖南音乐文物拾零	曹学群 (182)
馆藏金铜观音造像述论	沈柏村 (192)
谈五代楚国货币及其影响	邓昭辉 (199)
清双管雕翎盔甲与“一品当朝”坎肩	陈国安 (208)
湘西苗族妇女服饰述略	余斌霞 (215)
何绍基的书法艺术赏析	王启初 (220)
论文征明的绘画艺术	刘 刚 (229)

现代历史与文物

试述中共湖南区委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	欧金林 (235)
从有关文物看湖南几大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制度	阎四秋 (242)
从四个通电看程潜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	张淑清 (248)

附 录

湖南省博物馆发展点滴	刘湘渝 (253)
湖南省博物馆 1986—1996 年大事记	聂 菲 朱丹菲 (258)
湖南省博物馆 1986—1996 年主要论著目录	郑曙斌 喻燕姣 (274)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

高至喜

铜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之一，以后演变为钟，又是两周时代约八百年间的一种重要的礼乐器。中国南方出土的商周时代的铜铙极具地方特色，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江南青铜文化的重要资料。现就江南所出商周铜铙的名称、型式、用途、年代、演变和产地等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名称

为了叙述的方便，首先要正名。关于铙的名称各家说法不一。罗振玉称铙^①，容庚名钲^②，郭沫若主铎^③，陈梦家叫执钟^④，李纯一谓钟^⑤，陈梦家还把南方所出之大铙名之曰镛^⑥。《说文解字》：“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又“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许慎把钲铙互训。《周礼·鼓人》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尔雅·释乐》和《说文解字》均谓“大钟谓之镛”。由上述记载，可知铙的形体小，“似铃、柄中上下通”，可以“手执”，这正与河南安阳、温县所出三至五个一组的商代小铜铙相合，而同南方所出之大铙不符。我认为南方所出之商代大铙可称为镛，南方西周早期有乳枚的中等形制的铙可以名钲，这样便与《说文解字》的解释全合了。鉴于目前考古学界大多数均以铙名之，约定俗成，在没有更恰当的名称之前，本文暂称南方商代铙为大铙。

关于铙的各部位名称，各家意见也有分歧，文献中没有关于铙的各部位名称的记载。由于铙与钟的结构大体一致，所以现在分析铙的结构时，一般借用了钟的各部位名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关于钟的各部位名称有较详细记载，这是比较可信的。不过人们在理解上仍有不一致的地方。目前大家对栻、铎、于、钲、篆、枚、甬、衡等名称所指部位看法比较一致，但对旋、旋虫（鞞）、隧、鼓等所指部位分歧较大，常见的是旋、鞞相易，鼓、隧互混。由《考工记·凫氏为钟》的文意推之，还是夏鼐先生的意见为是。他认为甬上凸出之带形物为“旋”，“旋上之钮为“旋虫”，即谓之“鞞”；口部中间为“隧”，两侧叫“鼓”^⑦。“旋虫”之名我意可能是因为旋上之钮似虫而来。有的认为《纪侯钟》上钮上之环为旋^⑧，恐不确，因为目前所见周代甬钟绝大多数无环。本文在叙述铙的各部位名称时，均采用夏鼐先生的意见。

二、型式

中国南方商周铜铙在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江苏九省均

有出土。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已有 43 件，其中湖南 23 件，江西 9 件，湖北 2 件，安徽 2 件，浙江 3 件，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各 1 件。按时代分，商代的 28 件，西周早期的 15 件，可以分为五型。

A 型 为兽面纹大铙。共 15 件，多出土于湖南。大多数型体高大厚重，钲部短阔，作合瓦形，甬部有旋。特点是用断面作半圆形（个别的为扁平形）的粗线条组成兽面纹为主纹，其余部位多饰云雷纹。可分为四式。现分别介绍于下。

1 式 11 件。均出自湖南的湘水流域。组成兽面的粗线条作半圆形。

1. 兽面纹大铙之一 1978 年出土于宁乡县老粮仓北峰滩，即望北峰山麓，修筑公路时发现。出土时距地表 1 米。铙的颜色土褐，通高 89 厘米，钲间宽 58.5 厘米，重 109 公斤。形制巨大，气魄雄伟，击之声音宏亮。最奇特的是在器内近口沿处铸四只卧虎，可能是为调节音的频率而设^⑧（图版二，1、2）。

2. 兽面纹大铙之二 与上述四虎兽面纹大铙同时出土，相距仅 5 米。造型纹饰也同，只是形体更为高大厚重，甬部残缺，残高 84 厘米，桀长 53 厘米，钲间宽 63.5 厘米，重 154 公斤。是现有铜铙中较大的一件。

3. 兽面纹大铙之三 1971 年岳阳县黄秀桥公社滨湖大队的费家河河边发现。出土时口朝上，距地表 40 厘米。颜色褐中间蓝。通高 74 厘米，桀长 46 厘米，钲间宽 55 厘米，重 82 公斤^⑨。

4. 兽面纹大铙之四 1974 年宁乡唐市公社陈家湾附近的楚江河岸出土。出土时口朝上，距地表仅十多厘米，原来的地表土在改田时已取去不少。铙的颜色土褐。通高 71.8 厘米，桀长 42.8 厘米，钲间宽 46.5 厘米，重 85.75 公斤（图版二，3）。

5. 兽面纹大铙之五 1959 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出土。同时出铜铙 5 件，还有象纹大铙 2 件，虎纹大铙 2 件。出土时下层放 4 件，两个一排，上层放 1 件。均口朝上，距地表仅 1 米。铙的颜色土褐。通高 66.7 厘米，桀长 44.7 厘米，钲间宽 49.7 厘米，重 67 公斤。坑中出有紫黑胎黑衣陶片，有的饰方格纹、弦纹或附加堆纹，还有红胎素面陶片，具有商代作风^⑩。

6. 兽面纹大铙之六 1964 年出土于湘乡县狗头坝商代文化遗址中。形体较小，高 44 厘米、桀长 30 厘米、钲间宽 30.5 厘米，重 18 公斤。遗址中出夹砂粗红陶、泥质褐胎黑衣陶、灰胎方格纹硬陶等陶片^⑪。

7. 兽面纹铙之七 1977 年望城县高塘岭公社高冲大队出土。出土时口朝上。通高 48 厘米、桀长 29 厘米、钲间宽 32 厘米，重 18.75 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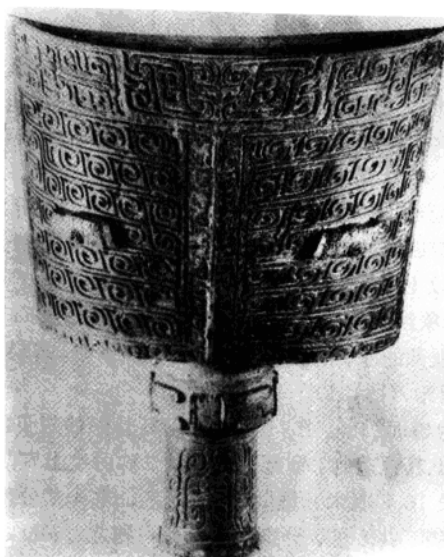
8. 象纹大铙 1983 年湖南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出腰出土。出于一圆形坑中，填土中有方格纹夹砂红陶片、重圈纹黑陶片及泥质褐陶片等。位于一商代遗址的西部边缘，距出土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的地点仅 250 米。铙的隧部有两只相向的立象。通高 103 厘米、桀长 67 厘米、钲间宽 69.5 厘米、于间宽 48 厘米、鼓厚 2.9 厘米，重 221.5 公斤^⑫（图版二，4）。

9. 蟾蜍纹大铙 1985 年湖南浏阳柏嘉出土。浅绿色。兽面的两眼为浮雕的蟾蜍，蹲踞昂首，两眼突出，作伺机一跃之状。钲部周围、鼓、隧、甬及蟾蜍身上均饰云雷纹。通高 43.5 厘米、甬长 15 厘米，桀长 28.5 厘米，钲间宽 32.8 厘米，于间宽 22.3 厘米，重 20.7 公斤^⑬（图版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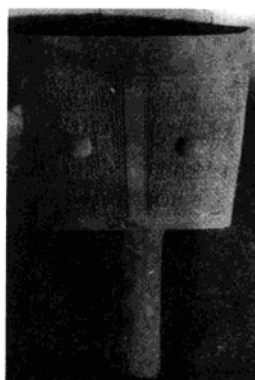
10. 虎纹大铙之一 与上述 8 号象纹大铙同时出土。形体比象纹大铙略为轻薄，鼓部饰卷尾张口的老虎。通高 70 厘米、桀长 44 厘米、钲间宽 47 厘米，重 55.75 公斤^⑭（图版二，6）。



1. AⅡ式, 象纹大铙
湖南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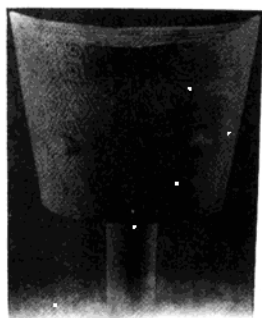
2. BⅠ式云纹大铙
宁乡黄材三亩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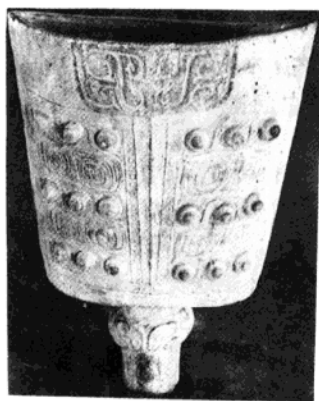
3. BⅠ式云纹大铙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藏



4. BⅠ式云纹大铙
安徽潜山出土



6. C型有乳钉铙
湖南湘乡黄马
寨出土



7. D型有枚铙
湖南醴陵出土

5. BⅡ式勾连云纹铙
江西新干大洋
洲商墓出土, 江
西省博物馆藏

8. E型齿纹铙
湖南株洲县
朱亭新龙村
出土 (1、2、
6、7、8均湖
南省博物馆
藏品)



图二 商周铜铙

11. 虎纹大铙之二 与上述虎纹大铙同时出土。通高 69.5 厘米, 栾长 42.5 厘米, 铙间宽 47.5 厘米, 重 71.5 公斤。隧部兽面较窄, 旋部有 C 形纹。

Ⅱ式 2 件。一件为象纹大铙与兽面纹大铙之五同时出土。形制、主纹与兽面纹大铙相同, 惟此铙纹饰更加繁缛, 铸造更精, 特别是组成兽面纹的粗线条上也饰云纹。通高 70 厘米, 栾长 44 厘米, 铙间宽 46.2 厘米, 重 67.25 公斤。钲左、右、下三方边缘饰六虎、六鱼和十一个乳钉, 隧部有兽面纹, 兽面的鼻梁处作牛首状, 两侧为龙纹, 鼓部各有一卷鼻立象。另一面纹饰全同。甬部有四个乳钉, 除舞部无纹饰外, 全身布满云雷纹(图版二, 7、8)。另一件出自安徽庐江, 主纹上布满云纹, 但无象纹^⑩。

Ⅲ式 1 件。为象纹大铙。与上述象纹大铙同时出土。不同之处是组成兽面纹的线条扁平, 主纹上也饰云纹, 钲部的左、右、下三边无虎、鱼装饰, 乳钉一面只有九个。柄断。栾长 40.3 厘米, 铙间宽 43 厘米(图, 1)。

Ⅳ式 1 件。为兽面纹铙。1974 年湖北阳新县白沙刘荣山出土。出土于接近山顶的地方, 距地表 1.5 米, 未见其他遗物。钲部饰兽面纹, 兽面纹上有阴线云纹。甬部无旋。音高为 C1。残高 27 厘米、栾长 18.8 厘米、铙间宽 21 厘米, 重 4.7 公斤^⑪。

B 型 为云纹铙 共 8 件。分别出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特点是由云纹组成一兽面为主纹, 两目凸起。除湖南外, 其余各地所出之铙形体较小, 甬上无旋。可分三式。

I 式 2 件。

1. 云纹大铙之一 1973 年湖南省宁乡县黄材三亩地一个椭圆形坑内出土。出土时距地表 30 厘米。通高 66.3 厘米、栾长 41.8 厘米、铙间宽 49.8 厘米, 重 79 公斤。颜色翠绿。主纹为云纹组成的兽面, 两目高起作菱形(图, 2)。铙的附近还出有环、玦、龙、鱼等精美的白玉器^⑫。

2. 云纹大铙之二 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甬部无旋, 鼓部饰云纹, 钲周饰圆圈纹, 兽面两目作隋圆形, 上有螺旋纹。钲部主纹为云纹, 钲两侧各有等距的六朵云纹的尾部上翘, 似为以后钲部 36 枚乳钉出现的先兆。通高 43.5 厘米, 铙间宽 30.7 厘米, 重 19.4 公斤^⑬。

Ⅱ式 5 件。主纹为由云纹组成的简化的兽面, 地纹有密集的细圆圈纹, 甬部无旋, 出于江西新干, 湖北阳新刘荣山(第二件)、浙江余杭、江苏江宁、安徽潜山等地。

1. 云纹铙之一 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甬部无旋, 钲体作六边形, 主纹为细阳线云纹组成的简化兽面, 地纹为密集的小圆圈纹。通高 41.5 厘米, 铙间宽 29.1 厘米, 重 18.1 公斤^⑭(图, 3)。

2. 无旋云纹铙之二 1963 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县石滩田家畈。形体较小。通高 29 厘米、栾长 17 厘米、铙间宽 20.2 厘米。钲部以云纹组成的兽面为主纹, 以圆圈纹为地纹, 舞部有云纹, 甬部无旋, 并与内腔不通^⑮。

3. 无旋云纹铙之三 1974 年江苏省江宁县塘东村一个土岗顶部出土, 距地表 40 厘米。铙呈绿色。通高 46 厘米、栾长 26 厘米、铙间宽 31 厘米, 重 32 公斤。钲部主纹也是由云纹组成的兽面, 以细圆圈纹为地纹, 舞部有云纹, 甬部无旋, 与内腔相通。钲体作六边形^⑯。

另二件出于湖北阳新、安徽潜山(图, 4)。

Ⅲ式 1 件。勾连雷纹铙。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甬部无旋。鼓部、钲间和钲周饰云纹, 主纹为勾连雷纹, 两目凸起作椭圆形。通高 45.3 厘米、铙间宽 32.3 厘米, 重

22.6 公斤^② (图, 5)

C 型 有乳钉铙 5 件。出于湖南醴陵、湘乡、福建建瓯、浙江长兴等地。

1. 有乳钉铙之一 湖南株洲县伞铺出土。呈土褐色, 隧部有兽面, 鼓部各饰一立虎, 一虎卷尾, 另一虎尾下拖, 铎部饰满云纹, 并饰乳钉 36 个, 铎每面 18 个, 分为两组, 每组 3 排, 每排 3 个。乳钉不断升高, 便发展为以后出现的枚。通高 52.7 厘米、栾长 33.5 厘米、铎间宽 37.3、于间宽 25.2 厘米, 乳钉高 1.6 厘米, 重 24.2 公斤^②。

2. 有乳钉铙之二 1975 年湖南省湘乡金石公社黄马塞出土。铎部每面有乳钉三排, 全器共 36 个, 乳钉呈扁圆形, 上有螺旋纹。甬部有三角云纹, 无旋。通高 39 厘米、栾长 25 厘米、铎间宽 29 厘米, 重 14.65 公斤^② (图, 6)。

3. 乳钉铙之三 1978 年福建省建瓯县小桥公社黄科山西坡出土。出土时距地表 25 厘米, 口朝下。是 C 型铙中之最大者。全身满饰云纹, 铎部有乳钉 36 个。通高 76.8 厘米, 栾长 47 厘米, 铎间宽 56.6 厘米, 重 100.35 公斤^②。

4. 有乳钉铙之四 1959 年浙江省长兴县草楼村出土。出土时平放, 距地表 80 厘米。通高 51.4 厘米。纹饰与建瓯所出之铙相同, 但体形稍小^②。

5. 有乳钉铙之五 1969 年浙江省长兴中学出土。甬残, 现存高 28.5、栾长 21 厘米、铎间宽 27 厘米, 重 16 公斤。形制、花纹与上铙相似, 惟形体更小^②。

D 型 有枚铙 共 15 件。湖南、广西、广东、江西均有出土。特点是仍以云纹为主纹, 但趋向简朴, 乳钉逐渐加高而为枚, 向甬钟过渡, 甬部有旋, 但尚无旋虫。

有枚铙出土数量甚多, 较重要的有:

1. 有枚铙之一 湖南醴陵出土。篆间已初步形成, 铎周围和铎间两侧有圈点纹框边。通高 29.8 厘米、栾长 21 厘米、铎间宽 21.6 厘米、枚高 0.9 厘米, 重 7.2 公斤^② (图, 7)

2. 有枚铙之二 1970 年湖南省长沙县望新公社板桥八队出土。出土时距地表 60 厘米, 口朝上。通高 43.5 厘米、栾长 30.5 厘米、铎间宽 25.7 厘米, 重 10.5 公斤。旋上有 C 形花纹, 枚已较高^②。

3. 有枚铙之三 1980 年湖南省耒阳县夏家山山腰出土。出土时平放, 距地表 20 厘米。通高 32 厘米, 栾长 24 厘米, 铎间宽 25 厘米, 重 5 公斤。篆带已初步形成, 并有细线雷纹, 枚作尖锥状, 更接近于甬钟上的枚^②。

4. 有枚铙之四 1976 年广西灌阳仁江钟山出土。甬残, 现存高 36 厘米、铎间宽 28 厘米, 重 10.5 公斤。篆间饰细线雷纹, 并以圈点纹框边, 枚作尖锥状^②。

5. 有枚铙之五 1962 年江西省新余市主龙山山坡出土。浅绿色。枚作“双叠圆台状”, 旋部有 C 形花纹, 篆, 隧部饰云纹。通高 51 厘米, 重 25 公斤^②。

6. 有枚铙之六 1972 年湖南省株洲县太湖公社头坝的一个山坡上出土。通高 34.5 厘米、栾长 24.5 厘米、铎间宽 22 厘米, 重 14.65 公斤。枚已较高。篆间饰雷纹, 甬部有旋, 舞、鼓部无纹饰^②。

7. 有枚铙之七 1991 年湖南安仁豪山乡荷树组后山出土。出土时口朝上。呈浅绿色。铎间篆间均已形成, 枚作平头柱状, 高 1.7 厘米。隧部饰粗云纹, 篆间饰细线云纹, 铎四周和铎间两侧有圈点纹框边, 在一面铎间靠上部饰一立体的小鸟, 极为少见。通高 42.8 厘米、栾长 28.6 厘米, 铎间宽 28.8 厘米, 重 9.1 公斤^②。

此外, 还有广州佛岗 1 件^②、江西新余 3 件^②、泰和 1 件、靖安 1 件^②、湖南衡阳县泉口 1 件^②、株洲漂沙井油圳 1 件^②。

E型 为特殊型铙 仅1件。1988年湖南株洲县朱亭黄龙乡新龙村出土。浅绿色。主纹为一简化的兽面，组成兽的图案很奇特，由两个相向C形，并在C形两边加齿纹组成，每边的锯齿数不完全对称，每短边3至7.5个齿，长边9至11个齿，眼睛由两个小龟表示，龟头作三角形，龟尾小，偏向一边，两侧鼓部各饰一条龙纹，头作三角形，有四只小而长的足，身上有毛。通高41.5、栞长30.4、铣间宽31厘米，重11.05公斤^④（图，8）。

三、用 途

关于铙、钲、钟的用途，历来论述颇多。一般认为钲（指南方的大铙）是“专用于军旅”，句铙“专用于祭祀宴享”，但钟（指中原的商代小铙——笔者按）仍可兼用^⑤。我认为南方的大铙不但可以用于军旅，类似铜鼓，“击鼓山顶，足以号召部众，指挥军阵”^⑥，而且也可以用于祭祀宴享。

南方出土的铜铙，出于山顶、山坡、山麓的有湖南宁乡师古寨的五件、北峰滩二件，转耳仑、三亩地各一件，还有湘乡金石、耒阳夏家山、望城高塘岭、安仁荷树组、江苏江宁、福建建瓯、江西新余市各一件。出于河岸湖边的有湖南岳阳湖滨和宁乡唐市的二件。这些铙大多数是单个出土，只有宁乡师古寨山顶一坑出五件。出土时几乎都是口朝上，甬在下，只有少数铙是平放或口朝下，距地表在1米以内，没有别的东西伴出。这些现象说明这些铜铙很可能是当时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等的遗物。还有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的商代象尊，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四羊方尊，湘潭金盆养鲤出土的商代豕尊等著名铜器出土时都属于同类情形。

我们知道，商人最迷信鬼神，最重视对祖先和对自然神的崇拜，而且祭祀繁多，由甲骨文中大量关于各种祭祀的记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殷人所祀鬼神对象有风雨，有星辰、有河岳、有土神……等”^⑦，每次祭祀要用大量牺牲和礼器，所以大量青铜礼乐器在祭祀之后被就地埋藏下来。楚是商的同盟，它接受着商文化在南方发展，到春秋战国之时，楚仍保持着这种风俗，如山东泰安就发现有楚人祭祀泰山或祭天的遗物^⑧，可以作为我们上述推断的旁证。

四、年 代

中国南方所出铜铙，不少考古学家把它们的年代定在商末至西周前期，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认为铙的整个年代还可以适当提早，并可以推断出它们更具体年代，即A、B型铙可早到商代晚期，C型铙可定在商代末期至西周初年，D型铙属西周早期。理由如下。

A型铙是各类铙中铸造最精美，花纹最繁缛，形体最高大的一种，这就反映出它的时代风格。张长寿先生对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提出了一个分期序列，他把商代晚期即殷墟的铜器分为三期，第二期为极盛时期，其代表性器物如“妇好”墓中的铜器，牛鼎、鹿鼎及司母戊鼎都属于这一期。他还认为湖南宁乡黄材发现的青铜器“大致是殷墟第二期或第三期的器物”^⑨。我认为这个推断是正确的。湖南宁乡所出商代铜器多数属于第二期，A型铙也应属于这一期，而不会晚至商末。殷墟第二期的铜器特点是：胎质比较厚重，花纹比较繁缛，出现了三层花纹，动物形纹饰很流行……^⑩，湖南所出A型铜铙正符合这些特点，如AⅠ式象纹大铙的纹饰有三层花纹，纹饰中多兽面、象、虎、鱼等动物纹，铙上的云纹与属于殷墟第二

期的宁乡黄材出土的兽面纹（即饕餮纹）甗的云纹和桃源漆家河出土的“皿天全”方彝盖上的云纹风格是一致的^④。因此，从A型铙的时代风格看应属殷墟第二期。

B型铙以云纹为主纹，细观这类云纹就是从A型铙的鼓部云纹和组成兽面纹的粗线条上的云纹发展而来的。虽然其纹饰已开始趋向简化，已不如象纹、虎纹铙那样繁缛，但其形制和纹饰中的兽面仍属商代作风，故可定在商代晚期偏后。在B型铙中有3件出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之中。该墓的年代虽然在学术界尚存在分歧，但属商代晚期已无疑问。笔者将其定在殷墟中晚期之际前后^⑤。江苏江宁和浙江余杭所出之铙原定在西周早期，因篆间尚无乳钉出现，虽然要比宁乡三亩地的云纹铙略晚，但仍可早到商代晚期。

C型有乳钉铙形体变小，主纹仍是云纹，说明与B型铙时代相近。但篆间已有36个乳钉，应是西周甬钟上枚的滥觞，并表明其时代较晚。乳钉形体扁圆，上有螺旋纹，与A型铙中象纹铙钲部边缘上的乳钉相同，应是由此发展而来，故又与A型铙的时代相距不会很远，所以定在商末周初较为适合。

D型铙钲部已逐渐加长，已由短阔变为近正方形或狭长形，乳钉也加长变为尖锥状，钲间也逐步形成，纹饰更趋简朴，甚至草率，多为细线雷纹，不论是形制，还是纹饰，更接近于西周早期之末的甬钟了。但尚无旋虫，可能仍是植于座上仰击，又还是属于铙的范畴。现在西周最早的年代比较可靠的甬钟是陕西省宝鸡竹园沟强伯墓（M7）出土的铜甬钟一组共3件（这三件铜甬钟原来并不是一套，最小一件钟的纹饰和两个音高数据，均与前两钟不配套），年代在康王晚年至昭王前期^⑥，甬钟的铸造年代可暂定在康昭之际。这时的甬钟形体更为狭长，枚更加高，旋虫出现，后世流行的甬钟此时已经定型。从发展序列看，D型铙要比强伯墓中的甬钟要早，故可定在西周早期。湖南省出土甬钟中与强伯墓的甬钟时代相近的有宁乡县黄材附近出土的一件云纹甬钟，原定在“春秋或战国早期”^⑦，看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强伯墓中的甬钟非常相似，应是西周早期康昭之际之物。

E型铙是一种特殊类型，只有一件，其钲部的锯齿纹、兽面、以小龟作眼睛、鼓部的龙纹等均未见于其他类型的铙。但铙的形制又与B、C型铙接近。如钲间宽度只略大于栾长，已接近C型铙，但又无C型铙钲部的36个乳钉，故又应比C型铙略早。兽面已变形，大大简化，故应比A型铙为晚，其年代应大体与B型铙相当，即相当于商代末期。

五、演 变

铙的年代既明，要研究它的演变规律就不困难了。根据目前资料，南方最早的铜铙是湖南出土的A型铙。此类铙铸造甚精，并已定型，应还有更早更原始的铙，尚待今后去发现。

铙的发展序列是：A型——B型——C型——D型——甬钟。

现在分别从形制、纹饰、乳钉等方面考察一下铙的演变过程。

A型铙多数形体高大，较晚的形体变小，B型铙形体较小的多，C型进一步变小，D型除个别的较高大外，大多数形体小。A型至C型铙钲身短阔，即钲间宽度超过栾长，发展到D型铙时已近方形或狭长。

纹饰变化最为明显。A型铙流行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为主纹，到B型铙时这种兽面纹消失了，只剩下A型铙中的云纹，并布满全器作为主纹，在云纹中加上两只眼睛表示兽面，A型铙上的虎、象、鱼等动物纹不见了。C型铙仍以云纹为主，但不组成兽面出现，发展到D型铙时，云纹变得简朴、稀少，并变成了细线条，鼓部已没有云纹。